

难怪每个童话故事都要以盛大婚礼为结局：花束、金银纸屑、新娘的婚纱如云如雾，把她衬成了仙子——

西式婚纱与中式礼服

那一年，带4岁的女儿小年去参加远房亲戚的婚礼，她一直很兴奋：“公主，公主——”新娘是，穿着小礼服的伴娘也是，送嫁的姐妹团也是，迪士尼七公主般花团锦簇。宴席上，小年不停问我：“妈妈，什么时候跳舞呀？”她天真地以为，会像每一部动画片，王子与公主翩翩起舞，幸福定格在这一瞬。

吃得差不多，新娘换了中式小凤仙装过来敬酒。小年真心沮丧，悄悄对我说：“公主变服务员了。”我赶紧捂她嘴。可不是，那大红、刺绣、龙凤、高领、对襟，全是最俗丽的中式元素，服务员、迎宾员最容易穿成那样。

白纱礼服与白西服都是脱离现实的，不折不扣，专为婚礼、盛事准备。那一刹那她与他与众不同，那一刹那她与他万众瞩目，无论多么平凡微贱的男与女，都是全宇宙的中心。

全世界女孩子对婚纱都有相同的渴求，美国的肥皂剧里、日本的长篇晨间剧里，甚至一位也门少女的自传，都会有相似情节：小女孩才八九岁，看到橱窗里穿在塑料模特儿身上凹凸有致的白纱礼服，顿时入了迷：这就是童话故事里的仙女呀——尤其是和路上女



人平凡的大妈衫、大T恤或者黑袍相比之后。还会有姐姐告诉她：你结婚的那一天，也会有这样一件白纱礼服。她从此开始憧憬：盛大宴会，很多礼物、巧克力，当然还有珠宝、新房子——一种新的生活。在音乐声中，白纱的她，从父亲的小公主变成丈夫的小皇后。

但中式礼服……正如我女儿的童言无忌，像服务员，而家庭服务员，几乎就是每位中国妻子的定位。拜过天地，祭过祠堂后，就是三日入厨下，漫长而永无宁日的家务劳动开始了。一日三餐、四季衣服，全靠主妇的一双手。叫花子也有三天年——除了主妇，她停手，全家停嘴，越过年越是她忙的时候。

无从确认，传统中式服装是怎么变成服务行业标配的，买件旗袍都要留神不要和茶艺馆撞衫。这大致是基于汉民族的淳朴天性：我们并无为节

日特意设计的礼服，过年的最高标准就是一套新衣服。

新嫁娘的红袄红裙，以中国人的节俭，是不可能让它久藏箱底的，要么渐渐就穿出来干活做饭，要么只怕就改作了小孩的衣被，慢慢地，它穿旧了，千疮百孔，如人生。

女孩子没有不想当公主的。最迷恋结婚的年纪，小女孩在纸上画出来的新嫁娘，都是一袭白纱，眼眸画成两颗星，是闪亮的喜悦与渴望。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报刊上看到的莆田富豪嫁女、山西矿主嫁女，新娘穿金戴银，满头翡翠，手臂上的玉镯子随便摘一两个下来都够在北京东三环买套房了——却无一例外穿着大红的中式礼服。这是父母自觉不自觉的期许吧：给你吃穿不尽、嫁妆满街，但要你三从四德，男人们欢好应酬，你便像服务员一般，侍立身后，笑语盈盈，端茶倒水。因为你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，你母亲的母亲，也是。小媳妇，不易为。

你想当公主还是服务员？想三千宠爱在一身还是任劳任怨？想轻歌曼舞过一生还是儿孙满堂，哭着说“奶奶一辈子没过好日子”？不言而喻。(据《家人》)

生活微博录

岁尾年头，总有许多希望无法留住，总有许多期待从心中浮现。忘掉已经过去了的遗憾，重新开始迈出明天的第一步。不管人们是否睡醒，太阳都会照常升起，依旧落下。与其追赶时间的脚步，不如走在时间的前面。

对你不好的人，你不要太介意，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；你学到的知识，就是你拥有的武器，可以白手起家，但不可以手无寸铁；你怎么待人，并不代表别人怎么待你，如果看不透这一点，只会徒增烦恼；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，好好珍惜，下辈子，无论爱与不爱，都不会再见。

如果婚姻只是搭伙做伴，那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凑合就好了。什么是妻子？不是只有一纸婚书就叫妻子，必须要有感情，并能获得男人的尊敬。什么是丈夫？不是娶了老婆就算丈夫，还要有足够的承担，把生活和家庭抗在肩上。什么是婚姻，能让你拥有更广阔的眼界，不一样的人生，才是婚姻。

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，吃了就没了。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，留下了就永久在，这就是人性。

对于生活的理解，才是生活最真实的客观。生活里许多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固执安排日子，却忽略了自己的个性和孤僻。活在世间，与世间同在，能想到与别人更多的分享，已经是人生那些辛苦的日子最美好的记忆，起码省却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挑剔。

打开幸福之门有四把钥匙：口中无德，目中有人，心中有爱，行中有善。口中无德，就是说话要留有余地，不对他人施加“软暴力”；目中有人，就是要走出自我的小天地，将心比心，坦诚相待；心中有爱，就是要在心田种下爱的种子，并小心地呵护它成长；行中有善，就是人到哪里，就把爱带到哪里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父母都是他们心里最柔软的一个念想，背井离乡，在外打拼，可以无比坚强，可一谈到父母，我们就哭了。其实我们是害怕，害怕来不及用爱、用所有去报答。但其实我们不知道，父母又何尝需要我们报答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好好生活，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。

幸福是什么，到底在哪里，谁都不知晓，只有自己清楚。自己的幸福，全靠自己管理。



上海人的幽默感

大概地说，北京人幽默得有点泛滥了，上海人不解幽默。

有一位电影导演在北京的一家馆子里吃饭，那家馆子专卖毛家菜，音箱里翻来覆去地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原声录音：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！”导演听烦了，对服务员说：“把喇叭关了。我都听两个小时啦。”服务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道：“我已经听两年了。”

北京人的幽默能够互动。还是那位导演，还是去饭店吃饭，小姐送上菜单，导演胡乱翻了翻，问：“有什么东西免费？”小姐很厉害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微笑免费。”快笑快笑。笑完了埋单。”

这一套在上海玩不开。有一位编剧上街买一支雪糕，一咬感觉满嘴面粉，一气之下幽了一默，他问售货员：“你们卖雪糕收粮票吗？”柜台后的两个

老阿姨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：“侬吃过雪糕伐？吃雪糕还要收粮票啊？介戆的闲话。乡下人。戆佗。”编剧的幽默感没卖掉，反被抢白了一顿，在上海卖弄幽默，往往适得其反，自取其辱。

还有一个和冷饮有关的传闻：三十年前，北京的导演陈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。他第一次来上海，穿得干干净净。他妈妈是南京人，告诉他上海人衣帽取人（不是以貌取人）、看不起外地人。火车到上海，他很有信心地踱出车站，感觉身边说上海话的旅客都没他穿戴齐整。那是个夏天，陈导演有点口干，便去路边的冷饮店买棒冰。“我要两根冰棍儿”，他很自信地说。卖棒冰的微微一愣，问道：“你一个人。”“是啊，一个人，要两根冰棍儿。”他转身咬着两根冰棍儿离开的时

候，背后飘来三个字：“乡下人。”

导演的上海同学后来告诉他，上海人不作兴一次买两根棒冰，他们先买一根，吃完，再买一根。

上海人不解幽默出自上海人事事讲究功利，出自上海人计算的人生观，不耐烦虚言调笑的浪费。上海人的计算和经济，使上海方言里严重缺乏抒情的感叹词，没有实际功能的词汇也日益减少。

在京沪两地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名著《城市季风》里引用过一个很好的观察比较：做爱时，北京女孩情到浓处会高喊“我爱你”一类热烈誓言，而上海小姐则红着脸说“侬牢结棍格”（你好厉害啊）。“我爱你”是广告性的空虚赞叹，“牢结棍”是实务性的质量验收。男人喜欢哪种表扬？

（据《一生只为这一天》）

苏轼清淤

一提起苏轼，人们往往想起的就是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和画家，同时也是一位美食家，也许是他的多才多艺，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成就，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艺术巨匠，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。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这位水利专家的大手笔，他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”的创举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1089年，54岁的苏东坡以龙图阁

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，由于年久失修，西湖淤塞日甚，周边尽成农田，昔日如画的风景如今却是一派破败萧然的景象。苏轼下决心整治西湖，再现“人间天堂”的美景。

给西湖清淤，要解决两大问题：一是钱从哪里来，二是清出来的淤泥堆放到哪里。经过一番实地考察，苏轼制定了西湖整治的一整套方案。

为了解决从湖里挖上来的淤泥

无处堆放的问题，苏轼决定把淤泥堆置湖中，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，将西湖一分为二，大大缩短了人们环湖行走的路程。挖掉湖里的淤泥之后，召募农民在堤上种小麦，将种麦获得的收益用作修湖的资金。他还让人在堤上造了六座桥，附近遍植芙蓉、杨柳。这样一举多得，既筹集了资金，疏浚了西湖，便利了交通，又使西湖以一堤诗情画意留存千古。（据《文苑》）